

第二章 單向度概念的淵源

第一節 馬庫塞對歷史唯物論的解讀

在〈歷史唯物論的基礎〉一文中，馬庫塞指出「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發表勢必成為馬克思主義研究史上的一個劃時代的事件(a crucial event)，這些手稿使關於歷史唯物論的由來、本來涵義以及整個『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討論置於新的基礎之上。」¹由上述的引文可以得知，馬庫塞依據他所理解的《手稿》的思想觀點去重新詮釋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所謂置於「新的基礎」之上是指人們必須拋棄正統的認識馬克思主義的方式，而由一個新的觀點重新理解過往為人們所忽略的但真正代表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此種解讀就是關於「人」的理論，亦即人道主義哲學，因此馬庫塞認為《手稿》是馬克思的主要哲學著作，它極為明確地表述了馬克思的哲學思想，它的人道主義理論「預示著成熟的唯物主義理論」。

〈歷史唯物論的基礎〉(The Found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²代表馬庫塞生涯中的重要轉捩點³，這可說是對馬克思的新認識。

Martin Jay 在《辯證的想像：法蘭克福學派史》一書中對〈歷史唯物論的基礎〉的要旨作出明確概括：「馬庫塞同意馬克思說的勞動是人實現其本質的手段，……資本主義的恐懼是由於它培養了一種特殊類型的客觀化而造成的，在此他同意《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對異化勞動(alienated labor)的分析。馬庫塞認為非異化勞動是為著人而非反對人，只有通過社會活動，人的『類存在』(species being/Gattungswesen)⁴才能實現，資本主義由於妨礙了這一點，所以成為『人類本質的災難』(catastrophe of human essence)而需要一種『總體革命』(total revolution)。」⁵

關於異化勞動的探討，馬庫塞指出：「假如我們更進一步地考察馬克思對異化勞動的敘述，我們就會有一個令人注目的發現：這裡所闡述的並不僅僅是一個

¹ Herbert Marcuse, *Studies in Critical Philosophy*(Boston: Beacon Press, 1983), p.3

² 〈歷史唯物論的基礎〉是馬庫塞最早的，也是討論馬克思早期著作最詳盡的單篇論文，此篇論文的德文原名為〈歷史唯物論基礎的新起源〉(Neue Quellen zur Grundlegung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英文譯名則為〈歷史唯物論的基礎〉(The Found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³ 馬庫塞在回憶《手稿》對他的影響時說：「在這整個期間，我已經讀了馬克思的著作，並且還準備繼續研讀馬克思。然後《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出版到來。或許那是一個轉捩點，就某種意義來說，這是一個新的馬克思，他是真正具體的，同時超出了僵化的實踐型馬克思主義與理論型馬克思主義。從那時起，海德格與馬克思相較對我來說已不再是一個問題了。」參見 Douglas Kellner,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84, p.77-78

⁴ 馬克思視人為一種「類存在」(species being/Gattungswesen)，而此一類存在的內涵包括三個幅度：一、人是有意識的自由人，二、人是自然人，三、人是社會人。這三幅度在工作(Arbeit)概念的中介之下，形成人之整體。轉引自〈社會主義人性論之省思〉，楊世雄 著，收錄於《哲學雜誌》第二期，第46頁。

⁵ Martin Jay,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195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6, p.75

經濟問題。這是人的異化(the alienation of man)，生命的貶損(the devaluation of life)，人的現實(human reality)的歪曲(perversion)與喪失(loss)。在相關章節中，馬克思曾經指出：「異化的勞動，亦即異化的人(alienated man)、外化的勞動(estranged labor)、外化的生命(estranged life)、外化的人(estranged man)。」⁶因此，馬克思所說的人的勞動具有直接反映人的本質、人的真正存在狀態的涵義。

馬庫塞在詮釋馬克思的《手稿》時，同意勞動是唯物主義的理論起點，勞動是人的本質演變發展的重要活動。依據 Peter Lind 的觀點，馬庫塞的歷史唯物論具有三個重大意義：

- 一、馬庫塞開始進入馬克思的整個革命理論。
- 二、雖然有使用海德格式的語言，但是意涵相去甚遠。
- 三、使用「人類勞動概念」作為之後的解放理論之根本範疇。⁷

根據馬庫塞，《手稿》顯示出在馬克思那裡勞動之概念不僅僅是政治經濟學上的一個技術性用語，它還引申為一個較為廣泛之自由理論的確定而直接的意涵。正是這個新的解放理論，形成了馬庫塞對馬克思具原創性和強有力的重新詮釋的指引視野。⁸

勞動是一個基本範疇，馬庫塞在分析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也推論出自己的勞動概念，通過此對勞動的分析也可看出馬庫塞對人的基本假設。馬庫塞認為解釋《手稿》的重點要由勞動著手，但是馬庫塞反對將勞動視為單純的經濟事實，馬庫塞認為勞動與人的本質有所關連，「如果勞動的異化意味著完全的非現實化與人的本質的異化，那麼，也就必須把勞動本身當作人的本質的真正表現與實現來把握。」⁹

馬庫塞將這種更加深遠的、有意識的與自然整個合而為一的潛能的實在性稱作「人類本質」(human essence)。人如果要完全成為他自己，就必須將他自己最好的部分投入對象中，在自然界留下他的烙印，並且在與自然界鬥爭時發揮他的才能。

馬庫塞認為馬克思的勞動概念已經將整體人的存在作為研究的領域，馬庫塞進而強調若要深入研究此課題，首先必須回答馬克思是由何處開始為人的存在與本質下定義。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勢必成為理解異化勞動概念的真正意涵以及理解整個革命理論的基礎。馬庫塞在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推論出馬克思不僅將政治經濟學視作分析技術性的學科，而且是科學性、批判性的學科；此外，也不僅將勞動視為單純的經濟活動，而且與人的本質相關連。馬庫塞說：「起初，馬克思似乎想完全根據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及其一般原理來闡釋『異化』與『疏離』的道理。首先，馬克思特地把他的探索根據政治經濟學的傳統概念分為『工資』(The Wages of Labor)、『資本的利潤』(The Profit of Capital)與『地租』(The Rent of Land) 三個單元。但更重要的是，有跡象顯示出一個完全不同

⁶ Herbert Marcuse, *Studies in Critical Philosophy*, pp.7-8

⁷ 《馬庫塞的自由理論》，Peter Lind 著，關向光 譯，遠流，第 98-99 頁。

⁸ 《馬庫塞的自由理論》，第 99 頁。

⁹ Herbert Marcuse: *Studies in Critical Philosophy*, p.12

的新方向，就是這種劃分不久便被推翻與拋棄了：『從第二十二頁直到馬克思手稿的末尾，不管原有的標題是什麼，這三方面的內容是交叉地論述的。從第二十二頁到第二十七頁這六頁的文字，在現今的版本上加上了『異化勞動』這一標題』。¹⁰

異化勞動不僅是馬庫塞認為的馬克思的主要論點，也是馬庫塞藉以發展其解放理論的起始點。而在探討勞動與異化勞動之前，必須對馬庫塞理論中的勞動者提出說明，亦即人的本質為何？馬庫塞基本上是由詮釋馬克思《手稿》中關於人是「類存在」的定義展開。馬庫塞指出「人是類存在。這不僅是說，人無論在實踐上還是理論上都把類---既把自己本身的類，也把其他物的類---當作自己的對象；而且是說(這只是同一件事的另一種說法)，人把自己本身當作現有的、活生生的類來看待，當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來看待。」¹¹人是一種「類存在」，亦即人是一種使「類」(他自己本身的類與其他存在物的類)成為他的對象的存在物。馬庫塞所提出的人與人類本質的存有論規定(ontological determinations)，都有賴於對馬克思所用的勞動概念之獨特詮釋而來¹²。一種存在物的類是指這種存在根據他的血緣與起源而得以存在的那個東西。它是指這種存在物所具有的所有特性中為全體所共有的「原則」，也就是這種存在物的一般本質。假如人能夠使每一種存在物的類成為它的對象，也就是說，人能在存在物的本質的存在中佔有每一種存在物質。正是由於這一原因，人能夠自由的與任何存在物產生關連：他不侷限於存在物的某種實際狀況和他與它的直接關係，而且能超出存在物的直接且特殊的實際狀況，在存在物的本質的存在中掌握其本質。他能認識與把握在每個存在物之內的可能性。他能按照存在物的「內在固有的尺度」開發與進一步處理任何存在物。而勞動正是以此為前提，因為人的自由根植於人具有與其自身的類產生關連的能力，以及人具有「自我創造」與自我實現的能力。如此一來，通過自由勞動這一概念，作為類存在的人與它的對象之間的關係就更加密切地被規定了。¹³

在有關對象性的部分，馬庫塞提出對象性與對象化的意義在於：對象化作為「對象性的存在物」的人的定義，不僅是說明人與自然的統一，也是這種統一的深刻基礎。這種真正的對象化是不能否棄的，因為它與人的本質有所關連。而可以被廢除的就是對象化的某種特殊形式，這種特殊形式就是物化(reification)與異化(alienation)。

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條件下，勞動的外化與異化表現出人的本質的外化與異化，表現出「人」在資本主義歷史現實中的真實境況。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勞動不是「自由的活動」，或者說不是人的全面的與自由的自我實現，而是對人的奴役並且使人喪失現實性。關於勞動的異化，馬庫塞描述如下：「勞動者在自己的勞動中並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並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並不自由地發揮自己的肉體力量與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到損傷、精神遭到摧

¹⁰ Herbert Marcuse: *Studies in Critical Philosophy*, p.7

¹¹ Herbert Marcuse: *Studies in Critical Philosophy*, p.15

¹² 《馬庫塞的自由理論》，第 102 頁。

¹³ Herbert Marcuse: *Studies in Critical Philosophy*, pp.15-16

殘。因此，勞動者只是在勞動之外才感到自由自在，而在勞動之內則感到若有所失。」¹⁴

勞動就是與解放有關的概念，也是瞭解人的本質的重要概念，然而在資本主義的實際勞動狀況是，勞動不僅僅生產商品，還生產「作為商品的自身與勞動者」，而且「勞動者創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成為廉價的商品」。勞動者不僅僅失去了他自己勞動的產品，而且創造了對異化的人而言的異化對象；他不僅僅隨著分工與勞動機械化程度的提升，而且逐漸被貶低為機器，也就是說，為了使自身能夠生存，他自身必須成為一種商品。所以，勞動不再是整個人的一種表現方式，而是成為一種「非現實化」，成了異化其自身的異化勞動。

馬庫塞認為馬克思理論中的勞動角色是：

一、由於異化勞動是對工人的所有人性的否定，而非異化勞動---真正的「自由勞動」---必須被視為「**人類本質**的真正實現」。

二、在人與自然全體的關係之中，只要勞動與人的潛能(potentiality)與可能性(possibility)有關，勞動就可被理解為「人類存在」之根本的存有論(ontology)範疇。

馬庫塞認為，從人的本質，以及人的存有論觀點來理解「勞動」，可以把人的一切內在性與特點揭示出來，而且可推論出：勞動是「人的自我創造活動」，亦即通過勞動，人第一次成為真正符合人的本性的人，因為人在勞動中「成為什麼」與「是什麼」是由自己決定的，所以他就能夠按照他所具有的本性來認識與對待自己。勞動成為人的本質活動，而異化勞動正好相反。

此外，勞動是一種有意識的與對象性的活動：人在勞動中，與他自己及他的勞動對象聯繫在一起，也就是通過勞動，人是一種對象化的存在物。而實際創造一個對象世界，改造無機的自然界，這是人作為有意識的類存在的自我確證，人透過勞動表明自己與動物和植物及無機界是不同的存在物。自由勞動是把他的存在轉成其本質的工具，可以賦予他本身的實在性，並且自己生產他自己與他的「對象性」¹⁵。而異化勞動則否。因此若要以革命推翻異化勞動，其革命就不只是角色的轉變，而是人性的轉變，馬庫塞認為「**人類本質**」是事實性，而非固定性。人的本質是與歷史的發展同步，「人的歷史經驗被吸納到人的本質定義中。」¹⁶總之，馬庫塞認為勞動的概念是超出經濟範圍，已深入到總體的人類存在，而了解勞動與人的本質的真實關係，才可理解為何要反對異化勞動以及解放。

¹⁴ Herbert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pp.277-278

¹⁵ 《1844 經濟學哲學手稿》，伊海宇 譯，台北：時報，第 69 頁。

¹⁶ Herbert Marcuse: *Studies in Critical Philosophy*, p.28

第二節 否定的辯證

根據馬庫塞的觀點，由於否定性思維(negative thinking)是創造性的社會批判的唯一源泉，他的確擔心社會生活中的創造性被湮沒。這種恐懼成了《單向度的人》的主題¹⁷，若往前追溯，否定的概念在《理性與革命》一書中就已初現端倪。

對否定性思維的挽救是馬庫塞在《理性與革命》中所從事的一項重要課題。談到這本著作的寫作動機時，馬庫塞指出：「寫作此書乃是希望對於一種瀕於消失之心智能力---而不是黑格爾---的恢復有點貢獻，這種心智能力就是否定性思維(negative thinking)的力量。」¹⁸對馬庫塞而言，「否定」是辯證法的核心範疇，「自由」是存在的最內在動力。由於自由得以克服存在的異化狀態，因此自由在本質上又是否定的。而否定(negation)、自由、對立(opposition)與矛盾(contradiction)則是構成黑格爾所謂的「理性」的基本要素。然而，「隨著經濟、政治與文化控制的不斷集中與生效，所有領域中的反抗已被平息、協調或消滅。」¹⁹於是，當技術文明的進程使人們在自己的言論與行動中只剩下承認甚至肯定現實或現狀(the status quo)的能力時，試圖恢復黑格爾辯證法中的否定性思維便顯得十分迫切。

對馬庫塞而言，辯證法是一種否定與批判的方法，因為否定性思維「它的功能乃是要打破常識的自是(self-assurance)與自滿(self-contentment)；要摧毀事實之力量及語言中所蘊涵的邪惡自信(sinister confidence)；要證明不自由在事物的核心裡是如此之甚，以致於它們內在矛盾的發展必然導致質的變化：既成事態(the established state of affairs)的爆發及毀滅。」²⁰顯然地，當馬庫塞如此強調「否定性力量」(power of Negativity)的功能時，他就已經暗示出他往後的批判方向。關鍵是在於否定性的具備與否，既是區別批判理性(critical reason)與技術理性(technological reason)的主要標誌，也是衡量社會與人是否成為「單向度」的重要依據。

馬庫塞試圖解釋黑格爾有關理性概念與辯證法中的否定性思維，他認為辯證思維就是否定性思維，是對既定事實的否定以及對既存社會體制的批判能力，而矛盾的精神(spirit of contradiction)是黑格爾辯證法中最有力的部份，馬庫塞指出：「黑格爾的哲學的確被稱為否定的哲學²¹(negative philosophy)。那個體現一般感官的假設事實確信，作為真理的實證標誌(positive index)存在於現實真理的否定(the negation of truth)之中，是一種原初的動機。通過這種否定，使真理能夠被承認。辯證法的力量存在於批判的確信之中，存在的一切形式都具有一種本質上

¹⁷ 《馬庫塞》，Alasdair MacIntyre 著，邵一誕 譯，桂冠，第 61 頁。

¹⁸ 轉引自《批判理論與現代社會學》，黃瑞祺 著，巨流，第 352 頁。

¹⁹ Herbert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p.434

²⁰ Herbert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p.ix, *passim*.

²¹ 馬庫塞在《理性與革命》的序言中指出「黑格爾的批判的與理性的原則，尤其是他的辯證法，必然與普遍的社會現實(prevaling social reality)發生衝突。由於這個緣故，黑格爾的思想體系被其同時代的敵對派別稱作否定的哲學。」 Herbert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p.vii

的否定性(negativity)，而這種否定性決定了它們的內容與運動(movement)。」²²這種理性的否定批判力是黑格爾辯證法的核心。所謂否定性就是自身內在矛盾，以及由於這一矛盾進展而揚棄自身，達到新的統一。

馬庫塞對於黑格爾的理解是革命性的、具有批判性的，透過對黑格爾與馬克思的比較，他發現兩者的進路儘管有所不同，但頗有聯繫，重要的是馬克思理論的核心在於經濟與社會的範疇，兼俱哲學批判與實踐精神。馬庫塞在馬克思的辯證(Dialektik)這樣基本的概念當中，馬庫塞認為黑格爾與馬克思的辯證概念是整體的否定，「對黑格爾而言，整體就是理性的整體、一個封閉的存有論系統(ontological system)，最終與歷史的理性系統相一致，黑格爾的辯證過程因而就是一個普遍的存有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歷史被存有的形上學過程所限定。另一方面，馬克思的辯證法則與這一存有論的基礎相分離(馬克思將辯證法從黑格爾的存有論基礎中解脫出來)。在他的著作中，現實的否定(negativity of reality)變成了一個**歷史條件(historical condition)**，一個不能被作為形上學關係狀態的而具體化的歷史條件。換句話說，它變成了一個與社會的特定歷史形式相聯繫的社會條件。馬克思辯證法所涉及的整體就是階級社會的整體，所涉及的形成其辯證的矛盾的否定性和限定其內容的否定性就是階級關係的否定。辯證法的整體也包括自然，但僅涉及進入社會再生產的歷史過程的自然和成為社會再生產的歷史過程的條件的自然。在階級社會的進步中，再生產在其發展的不同水平上表現出了各種各樣的形式，因而，導致所有辯證法概念的基本結構的形成。」²³

馬庫塞認為「馬克思理論的所有哲學概念都是社會與經濟的範疇，而黑格爾的社會與經濟的範疇都是哲學概念。即使馬克思的早期著作也不是哲學著作，它們表述的是哲學的否定，儘管它們是用哲學的語言表述。」²⁴馬庫塞就從這一點出發，在黑格爾的系統裡面，他把所有的這些範疇引進現存的秩序裡面，而馬克思的系統是將他的系統導向於對現存秩序的否定：

「在黑格爾的體系中，一切範疇都歸結為現存的秩序，而在馬克思的體系中，一切範疇都意指著對這一秩序的否定。……(馬克思的範疇)從本質上導向了一個只有通過廢除市民社會才能獲得的真理。在一切概念都是對現存秩序整體的控訴(indictment)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的理論就是一種批判(critique)。」²⁵

馬克思關於現實的辯證思想受黑格爾對這一思想論述的影響，即受現實的否定特徵的影響。對於馬克思而言，如同對於黑格爾一般，「真理僅存在於整體中，存在於否定的整體(negative totality)之中。」馬克思與黑格爾都主張真理僅僅存

²² Herbert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pp.26-27；此段引文的原文為：Hegel's philosophy is indeed what the subsequent reaction termed it, a negative philosophy. It is originally motivated by the conviction that the given facts that appear to common sense as the positive index of truth are in reality the negation of truth, so that truth can only be established by their destruction.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dialectical method lies in this critical conviction. Dialectic in its entirety is linked to the conception that all forms of being are permeated by an essential negativity, and that this negativity determines their content and movement.

²³ Herbert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p.314

²⁴ Herbert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p.258

²⁵ Herbert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p.258

在於否定的整體中。

此外，馬庫塞對於馬克思的辯證法亦相當重視，他指出「馬克思的辯證其特點在於否定，它是否定一個階級社會的存在，所以在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裡面，它是歷史運動的整體結構的一種改變，馬克思的辯證方法也顯示在盲目的經濟力量(blind economic forces)²⁶對於歷史過程的影響。而這種辯證是一個自然的社會規律('natural' laws of society)，馬克思與階級社會相結合的辯證概念是一種必然的概念(the concept of *necessity*)²⁷。」

而這一種所謂的階級社會的壓制，這個壓制都是在階級社會裡面才有的，所以他要的是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而沒有階級的社會並不同於私有財產的揚棄、私有財產的社會化、生產工具社會化，所以我們人的生產關係會是決定在我們人的意識，因為社會不是一個自由的、有意識的主體，如果人存在於這個社會以外，那麼這個社會是不可能轉變的，所以人的自由意識也就是人的意識形態是這一個社會轉變的必要的方式。

馬克思辯證法的特點在於歷史過程的否定性。馬庫塞認為，「馬克思的辯證法的歷史特徵包含著普遍的否定性(prevaling negativity)，也包含著自身的否定(its negation)。特定的關係狀態就意味著否定，否定之否定(the negation of the negation)伴隨著事物新秩序的建立。否定性(negativity)與其自身的否定是同一歷史過程的兩個不同領域，這兩個不同的領域被人類的歷史活動連接起來。『新的』狀態是舊的狀態的**真理**(*the truth*)。但真理並不是固定地和自動地從先前的狀態中產生，只有依靠人的自主活動(autonomous act on the part of men)取消現存否定狀態的整體(the whole of the existing negative state)，它才能產生。真理，簡言之，不是一個脫離歷史現實的領域，不是一個外在的歷史領域。可以肯定，它是超越特定歷史現實的，但這僅是就其從一個歷史階段向另一個歷史階段過渡而言。否定與否定之否定(the negative state as well as its negation)是在同一整體內的一個具體事件。」²⁸因此，馬庫塞一直強調自我的意識，它是超越現實的社會結構以外的東西，所以它一定要有一個主動意識才能產生否定，但是否定所產生出來的肯定或是產生出來的一個新的世界，這個新的世界並不是完全靜止的、完全自由的，它還是會轉變，所以它還是歷史現實、歷史階段，所以否定與否定之否定都是一個歷史事件，是具體事件，不只是一個思維的東西，因為這個社會變成另外一個社會的時候，它在變遷的過程當中會產生新的自我否定的因素，否定的否定

²⁶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當中有說到我們社會的結構體有一個獨立在我們個人的意識以外的下層建築；馬庫塞在此強調的是辯證是一種個體的自由。

²⁷ Herbert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316-317 所謂「必然王國」與「自由王國」的分野《1844年手稿》關於異化勞動的討論，在我們的經濟分配當中，人與人之間因為有財產和勞動之間的區別，所以就會形成所謂的資本利得與勞動所得之間的區別，所以那裡面的工作基本上來講不是自由的工作，那個雇傭勞動不是一個自由的雇傭勞動，所以它沒有辦法顯示出真正的人性的本質的顯示，而在馬克思的概念裡面只有到共產主義社會揚棄了所謂的私有財產，於是乎人開始了他的歷史，而馬庫塞在前面已經提到儘管把私有財產揚棄了，然而如果對個體自由的顯示沒有任何用處的時候，那是無用的，那就是所謂的蘇聯共產黨，它又形成另外一種壓制，所以在這當中，馬庫塞把我們人類所謂的自由解放要置於個體的每一個人的覺醒，也就是置於每一個人的自由。

²⁸ Herbert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p.315

是指一個東西只要有變化的話，它都會摻雜著先前的原因，先前的原因就是對於這個否定前面的東西的否定，所以它是一個整體，它是一個整體因素的整體。

至於馬庫塞在解釋馬克思「社會的存在決定社會的意識」時特別提到「當然，人的意識會受制於人的物質生產、社會的再生產，而人在進行這個生產的時候，總要去使社會的關係產生秩序，並且儘量地去朝向自由的發展提出貢獻，但是當這一個物質的生產是理性化的，而且是被有意識的人的工作(the conscious work of men)所形成的，那麼，意識對社會條件的盲目依靠(blind dependence of consciousness on social conditions)將不復存在，當理性被理性的社會關係所確定的時候，它就是被自我所確定，所以社會主義的自由包含著社會的意識與社會的存在之間的關係的兩面，所以歷史唯物論的原則是它自我的否定(its self-negation)。²⁹」³⁰馬庫塞所理解的馬克思的辯證是歷史的辯證，而這種辯證的有效性只限於階級歷史。當這一個物質的生產是理性化的，而且是被有意識的人的工作所形成的，那麼，人的主動意識受制於物質的生產將會停止。

辯證與否定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那一個前提就是主客體的同—。馬庫塞認為，「主客體的同—性」是馬克思與黑格爾所共有的，而這個看法則和許多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之詮釋不同。「主客體的同—性」要求分析的出發點不再是自在的客體或者脫離世界的主體，而是由主客體的相互關係所形成的總體類型(total pattern)。這個概念，黑格爾用「絕對精神」來表達；馬克思用社會是一個社會性的整體這樣的理念來表達；至於馬庫塞，則是用「否定的總體性」(negative totality)或者「辯證的總體性」(dialectical totality)來表達。³¹辯證法試圖把那些似乎分開或對立的現實面之間的基本聯繫重新建立起來，並把它們重新放回到一個較大的整體之內；而這個整體回過頭來又和另一個相似的「總體性」聯繫起來，以便顯出一個更為全面的總體性，諸如此類。馬庫塞認為從黑格爾辯證法到馬克思辯證法的過渡，本質上在於把黑格爾結合存有論與認識論的架構，轉換為一個廣泛的歷史發展的近似社會學的(para-sociological)理論。

馬克思的辯證法是黑格爾的辯證法的直接繼承。馬庫塞指出：「我們已經強調；馬克思關於現實的辯證法³²最初是由與黑格爾的辯證法相同的基礎所推動，即由現實的否定特徵所推動。」³³此段引文中的相同的基礎是指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事實，也就是勞動、異化勞動以及私有財產等。

²⁹ 那個就是絕對的自由，也就是馬庫塞的想法與社會存在的具體是完全吻合的，這個很顯然是在講否定的辯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那就是自我的否定，實際上來講，馬庫塞就是透過這東西在處理個體與整體之間的關係，個人的自由與社會的自由。

³⁰ Herbert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319-320

³¹ Herbert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pp.313-314

³² 馬克思的革命態度顯示在其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他在《資本論》的第二版跋明言，他的政治經濟學方法是辯證法，但他的辯證法有別於德國的唯心辯證，因為他的「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參見《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楊世雄 著，五南，第 133 頁。

³³ Herbert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p.312

馬庫塞在《理性與革命》中關於勞動的廢除，他指出「然而，由於至今('till now')仍然普遍存在的關係狀態是一個普遍的否定，影響到生活的每個領域，它的改變因而需要一個**廣泛的革命**(*universal revolution*)，那就是說這個革命，首先反對現存條件的**整體**(*totality of prevailing conditions*)，其次以一個新的**普遍秩序**(*new universal order*)代替這個整體。」³⁴既然現存條件的整體是異化勞動，那麼廣泛的革命便顯得十分迫切，否定現存條件的整體，始能代之以新的普遍秩序。馬庫塞指出「馬克思預想到未來的勞動方式與現行的勞動方式極為不同，因此，他在使用『勞動』('labor')一詞來同時指涉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的物質過程(material process)時顯得猶豫不決。馬克思在使用『勞動』('labor')一詞來表示資本主義歸根結底是由勞動來實際地理解的，也就是用它來表示在商品生產中創造剩餘價值(*surplus value*)，或者『生產資本』('produces capital')的活動。其他種類的活動都不是『生產性勞動』('productive labor')，因此不是嚴格意義下的勞動。因為勞動表明了自由與普遍的發展，所以是肯定勞動的個體的。很明顯，在關係狀態中，個體的自由(*the liberation of the individual*)直接表現著勞動的否定(*the negation of labor*)。」³⁵勞動的否定意指著個體的自由。

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批判，一方面在證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非理性、非人性；另一方面在說明社會主義，人性復歸的來臨，就如同馬庫塞所說的：「去分析現存的主流勞動形式，也就同時分析這一形式(異化勞動)被揚棄的前提。換句話說，馬克思在一個實際自由的社會中是著眼於異化勞動的否定而認識勞動的存在條件。馬克思的範疇是否定的，但同時也是積極的，它在它積極揚棄的光照之下，描繪一個否定性的現狀(*negative state of affairs*)。」³⁶積極的是指人的主動性，人在工作當中所表現的主動性，但它對於整體社會是一種否定，換言之，對社會的現狀而言，它是一種否定(*negation*)，描述一個被否定的現狀，那個現狀是被我們的主動意識所否定的。那就是辯證，那其實是否定性的辯證，而那個辯證要朝向一個所謂人的整體解放，在那途徑當中它是不斷地否定再肯定再否定再肯定，因為如果沒有那種積極性的話就沒有革命，因為革命是一種實踐。

³⁴ Herbert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p.288

³⁵ Herbert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p.293

³⁶ Herbert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p.295

第三節 馬庫塞對實證主義的批判

早在 1936 年發表的〈本質的概念〉(The Concept of Essence)一文中，馬庫塞就已對實證主義關於本質的看法進行了批判。他指出，實證主義者認為「一切和知識有關的事實都是等值的，事實的世界是單向度的(one-dimensional)，實在是『絕對實在』(“absolutely real”)，這樣一來就排除了任何趨向本質的形上學的或批判的超越。」³⁷對馬庫塞而言，實證主義並不僅僅是一種對於科學的「實證的」態度，也是對「經驗事實」的非批判順從態度。

馬庫塞不僅正面闡述黑格爾的理性概念，藉以說明黑格爾哲學是革命的，而且還把黑格爾的理性主義與實證主義(positivism)比較，藉以突出黑格爾哲學的革命性。馬庫塞指出，實證主義立足於事實，崇拜事實³⁸；黑格爾的理性主義立足於理性，崇拜理性，這就是兩者的主要區別。馬庫塞認為自孔德以來的實證主義者都將自己的理論建立在接受經驗事實的基礎上，確認實際發生的所有情況的可信性，而黑格爾竭力否定經驗事實的可信性，強調如果理性不能統治現實，現實本身就不會是合理的，主體只有滲透進自然和歷史的內容中，現實的合理性才是可能的。由於對待事實和理性抱有不同的態度，實證主義與黑格爾的理性主義在政治上也導致了不同的結果。實證主義變成了一種順從主義、保守主義、極權主義。

馬庫塞認為，實證主義由於推崇事實，因而否定了歷史發展的否定性，根本沒有任何批判、否定的精神，這種理論不可能改變現存社會，創造合理的社會，使人類獲得自由和解放。作為批判社會理論的基礎的否定性則著眼於人類的理想，而不能把自身建立在既定的事實上，只能建立在理性要求的基礎上。因此，否定哲學所關注的是人的存在，人的自由本質的實現，人的理想模式的動態發展，而不是遷就人已經存在的特定現實狀態。

馬庫塞說：「辯證法批判了所有形式的實證主義哲學。」³⁹而馬庫塞對實證理論的態度亦是如此，馬庫塞所指的實證主義就是那些想透過經驗法則建立起一套規則，而且試圖將社會法則類比成自然科學的那種學說。馬庫塞在《理性與革命》中指出了包括法國的孔德(A.Comte)以及德國的斯泰爾(F.J.Stahl)，依照他們所說的方法，實證主義者對待形上學的方法是拒絕人們有使用理性認識社會的能力。「實證主義的倡導者煞費苦心地強調他們哲學的保守態度與肯定態度：它使思想滿足於事實，拒絕任何對事實的超越與對現存條件關係的偏離。」⁴⁰「孔德

³⁷ Herbert Marcuse, *Negations*, p.65

³⁸ 馬庫塞強調馬克思理論的歷史與哲學性質，而與實證主義的社會學性質作一明顯的對比。他說：「以往實證的社會研究，就像自然科學追求自然律的有效性一樣，也是一門追求社會規律的科學。據此社會實踐、特別是涉及改變社會體系的事物、遂被無法避免、無法制服的力量所壓抑、所左右。以往社會被視為受制於合理的律則，這些律則乃與自然之必然性相推移。過去的這種觀點顯然與辯證的社會理論相左。蓋後者認為社會如受制於自然規律，則為一個不合理的社會……實證主義者對形而上學與玄學的棄絕，必然導致他們連人類依其理性意願而企圖改變或重組社會制度的要求也一併棄絕。」(Marcuse 1956:343-344)

³⁹ Herbert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p.27

⁴⁰ Herbert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p.27

受了德·馬斯瑞(De Maistre)的影響，斯泰爾則受了柏克(Burke)的影響。」因而在馬庫塞的分析中，實證主義看來像是柏克及德·馬斯瑞的繼承者，這種實證主義是爲了反抗黑格爾式的唯心論⁴¹。換言之，馬庫塞認爲實證主義與唯心主義在歷史上的對抗，現在已表現爲實證主義及保守主義的聯盟與理性的批判力量之間的對立。

除此之外，馬庫塞也對相對主義提出批判，他仍舊將焦點置於 19 世紀中葉的實證主義者。這些實證主義者堅持社會的科學理論必須保持價值中立。馬庫塞認爲「實證主義社會學」既不崇拜政治事實(political facts)也不譴責政治事實而是觀察它們…作為觀察的純粹客體(as simple objects of observation)。」當社會學變成了一個實證科學時，它脫離了與特定社會形式的「價值」聯繫。」⁴²馬庫塞甚至認爲現代社會學都是實證主義的相對主義的受害者⁴³，由此馬庫塞認爲相對主義的論點就是保守性的論點。他指出這種科學的世界觀不只是屈從於現實，而且偏好以一種中立的、抽象的方式來排除其他具有批判性的模式。在現今的學術傳統中，著重事實取向的模式已經結合了另一種「數學形式主義」來排除具有批判性的觀點。最早受到實證主義侵害的是技術領域，隨後而來的是人類的各種其他領域及過程受到實證主義的蠶食。馬庫塞指出，起初是以聖西蒙實證主義表現的論說與行動領域，便是既定的現實領域，在該領域中，客體世界正在被改造爲工具。至於以前是真正理性的思想領域的形上學，則成爲反理性與不符合科學的。

在《理性與革命》一書中，馬庫塞對實證主義的保守性格提出批判，而在《單向度的人》他則是擴展了此一批判的視野。馬庫塞認爲先進的工業社會有其哲學前提，因此他對現代哲學進行批判，並指出其「單向度」(one-dimensionality)的特點，所批判的對象是英、美流行的操作主義和語言分析哲學以及實用主義。

⁴¹ Herbert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pp.326-328

⁴² Herbert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p.354

⁴³ Herbert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pp.375-376

第四節 壓抑與宰治的邏輯

在正式進入馬庫塞對於單向度社會與單向度思維的論述之前，必須由《愛欲與文明》一書中探討當代工業社會的宰制形式以及人在心理層面所受的壓抑，這與「單向度」形成的根源有著一定的聯繫，馬庫塞所描述的單向度人的形象是現代人壓抑性的心理機制的外在表現，換言之，正因為壓抑已經深化到人的性格結構與心理機制之中，人的存在才是單面向的，人的單向度存在狀態只是一個結果，是人的心理受到壓抑的必然結果。

馬庫塞爲了對現存社會(即先進工業社會)的壓抑的組成要素作出分析，他引入兩種概念：

一、額外壓抑(*surplus repression*)：這是社會宰制不可或缺的約束。它與基本壓抑是有所區別的：額外壓抑是爲了使人類在文明中永久生存下去而對本能所做的必要「變更」。

二、操作原則(*performance principle*)：這是現實原則的現行歷史形式。⁴⁴

馬庫塞認爲壓抑並非真的是來自於匱乏，而是「匱乏的特定組織，以及這種組織所堅持的特定生存態度造成的。」⁴⁵馬庫塞接著說：「普遍存在的匱乏，在整個文明過程中被組織了起來(儘管是以很不相同的方式組織起來)，使它不按照個體的需求分配而是作集體的分配；組織人們獲取滿足需求的物品也不是爲了最好的滿足個體日益發展的需求。相反地，匱乏的分配、克服匱乏的努力以及工作的方式，都是強加於個體的，首先是訴諸暴力，接著是通過對權力的較爲合理的使用而達到其目的。但不管這種合理性對整體的進步是多麼有用，它仍然是宰制(*domination*)的合理性，而且對匱乏的逐漸征服也不可避免地牽涉到宰制利益所規定。」⁴⁶

由上述的引文中可以得知，匱乏已經被組織起來，而對人施加額外的壓抑，額外壓抑是隨著社會歷史的不同而有所轉變，且經常與必要壓抑交雜。而維持對人的本能進行壓抑的社會手段與方式，就是操作原則，這是現存社會的原則，也是馬庫塞所批判的對象。馬庫塞指出：「操作原則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進取的對抗性社會的原則。它的前提是，在長期的發展中，統治將變得越來越合理，因為對社會勞動的控制現在正以更大的規模、更好的條件再生出社會來。經過漫長的歷史發展，統治利益與整體利益匯合了，因為對生產設施(*productive apparatus*)的合理使用滿足了個體的需求和機能。對極大多數人來說，滿足的規模和方式受制於其自身的勞動。然而他們卻是在爲某種設施而勞動，並對這種設施無法進行控制，這是一種個體若想生存就必須屈從於它的獨立的力量。而且勞動分工越專門，他們的勞動就越異化。人們並不在過自己的生活，而只是在履行某種事先確立的功能(*pre-established functions*)。雖然他們在工作，卻不能滿足自己的需要和發揮自己的作用。他們是在異化中工作(*work in alienation*)。現在，工作變成了一

⁴⁴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Boston: Beacon Press,1974),p.35

⁴⁵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p.35

⁴⁶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p.35

般工作，因而導致了對力比多的約束：佔據極大部分個體生活時間的勞動時間是痛苦的時間，因為異化勞動(alienated labor)是對滿足的反動，對快樂原則的否定。力比多被轉到對社會有用的操作上去，在這些操作中，個體從事著同自己的機能和需要根本不協調的活動。因此個體僅就其為某一設施工作而言，才可說他也在為自己工作。」⁴⁷

文明的發展走到了它的反面，文明就是日益增強的壓抑，歷史的發展並沒有給現代文明注入活力，相反，現代文明是在一種更加壓抑、更使人痛苦的環境中展開。

馬庫塞認為，弗洛伊德認為文明的進步與負罪感(the sense of guilt)的增強有關，文明進步所付出的代價就是由負罪感的增強而導致幸福的喪失。弗洛伊德屢屢強調，隨著文明的進步，負罪感將得到「進一步的加強」。他一方面是從本能理論中得出這個論據，而另一方面，這個理論分析得到當代文明中的嚴重弊端的證實。

馬庫塞因此引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學的本能理論從各個方面分析現代文明的邏輯：社會的一切事物在其發展中形成對統治的服從與對本能的壓制，「正是文明的進步將會使合理性變得荒謬。現存的自由和滿足與統治的要求緊密聯繫；它們本身成了壓抑的工具。」⁴⁸

一、工作

馬庫塞認為，按現代文明標準來說，「文明」首先就是工作的進步，即為獲得和增加生活必需品的的工作的進步。「文明首先就是工作的進步(progress in work)，即為獲取和增加生活必需品的的工作的進步。這種工作本身通常不能帶來滿足；在弗洛伊德看來，它是不愉快的(unpleasurable)、痛苦的(painful)。」⁴⁹然而按照弗洛伊德，工作並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文明中的基本工作是非原欲的(non-libidinal)、是勞動(labor)；而勞動是件不愉快的事(“unpleasantness”)。因此人必須做的是件不愉快的事。」⁵⁰一言以蔽之，即在人的本能中，「工作」的能量與衝動並不存在，任何工作在原初可以說都是與自己的本能(追求快樂)相反的。

在馬庫塞看來，「確實，有一種工作能提供高度的原欲滿足，從事這種工作是令人愉快的。藝術工作是真正的工作，它似乎產生於一種非壓抑性的本能叢，並且有一種非壓抑性的目標。因而如果把昇華(sublimation)這個詞用於此類工作，其意義就必須有重大改變。但作為文明基礎的大部份工作則完全是另一種工作。」比如，「創造與擴大文明的物質基礎的工作主要是勞動，是一種異化勞動，是痛苦的和可怕的異化勞動，而且現在還是這樣一種狀況。從事這種工作，幾乎不能滿足個體的(individual)需求與傾向。它是由殘忍的必然性與無情的力量強加於人的；如果異化勞動與愛欲之間有任何聯繫，那麼這種聯繫必然是非常間接

⁴⁷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p.45

⁴⁸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p.92

⁴⁹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p.81

⁵⁰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pp.81-82

的，而且必然是一種與大大昇華的、因而也是大大削弱的愛欲的聯繫。」⁵¹

工作、勞動所抑制的是人的愛欲本能，勢必在發展中增強了另一種本能——死亡本能，文明社會的工作便越來越多地帶有破壞性傾向，這似乎是現代文明發展的必然邏輯。馬庫塞認為，弗洛伊德曾經在《文明及其不滿》中就對這一假說作過闡述。弗洛伊德就認為，對（人與動物的）生命的破壞隨文明的發展而發展，「後期工業文明的這一特徵具有使破壞性超出一切合理性而延續下去的本能基礎。因此，對自然的與日俱增的支配，同與日俱增的勞動生產率一起，只是作為一種副產品(*only as a by-product*)，才發展並滿足了人類的需求，因為與日俱增的文化財富和知識又提供了進一步破壞的手段，並加強了本能壓抑的需求。」⁵²

二、制度

馬庫塞認為，隨著社會的發展，更為嚴重的情況是對人的壓抑在不知不覺中成為我們所習以為常的「制度」或「體制」。他指出「弗洛伊德理論的核心是『統治--反抗--統治』(“domination-rebellion-domination”)這種週期性的循環。但第二次統治不是第一次統治的簡單重複。這種循環運動是統治的前進運動。從原始父親、經過兄弟宗族、發展到成熟文明所特有的機構化權利制度，統治變得越來越非個人化(*impersonal*)、客觀化(*objective*)和普遍化(*universal*)，同時也變得越來越合理(*rational*)、有效(*effective*)和多產(*productive*)。最後，在充分發展的操作原則統治下，使人屈從的、似乎正是勞動的社會分工本身（儘管物力與人力仍是必不可少的手段）。於是社會表現為一個持久的、擴展著的有用操作體系。等級制的功能與關係披上了客觀合理的外衣，法律與秩序成為社會的真正生命。正是在此過程中，壓抑也變得非人為化，因為對快樂的壓抑與管制現在成了勞動的社會分工的功能（與自然的結果）。」⁵³

馬庫塞指出，社會勞動等級制的發展，不僅使統治合理化，而且「遏制」了對統治的反抗。在個體方面，原始反抗是在正常的伊底帕斯衝突(*Oedipus conflict*)的框架內被遏制。而在社會方面，經常發生的反抗與革命則總是伴隨著反革命與復辟。從古代世界的奴隸造反一直到社會主義革命，被壓迫者的鬥爭總是以建立一個新的、「較好的」統治制度而告終；進步是通過改進控制的鏈條而取得。每次革命都成了一個統治集團代替另一個統治集團的自覺的鬥爭；但每一場革命也釋放了因「不滿足於這個目標」而要進一步消滅統治與剝削的力量。就此種意義而言，每一次革命也都是一次被出賣的革命。⁵⁴

因此，當社會「在政治上與經濟上把個體納入勞動的等級制度時，還有一個本能運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的統治對象再生著自身的壓抑。而且與日俱增的壓抑的合理化似乎也反映了與日俱增的權力的合理化。統治在使個體繼續作為勞動工具並強令其從事苦役(*toil*)與克制(*renunciation*)時，已不再單純是或主要是

⁵¹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pp.84-85

⁵²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p.87

⁵³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p.89

⁵⁴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p.90

為了維護某些特權，而是為了更大規模地維護整個社會。」⁵⁵就弗洛伊德的理論而言，原先只限於家庭及某個體生物權威的父親，在維持社會生命的管理中，在維持這種管理的法律中，得到了恢復，而且比以前更有權威。這些東西是父親的最後也是最崇高的體現，它們不可能通過解放而被「象徵性地」克服：人是不可能擺脫管理及其法律的，因為這些東西似乎就是自由的最終保證。對它們的反抗再次成了最大的罪惡，但這不是對壟斷著滿足的野蠻暴君所犯下的罪惡，而是對確保著為日益滿足人類需要所必需的物品與服務設施的美好秩序所犯下的罪惡。因此，反抗成了對整個人類社會的犯罪。

馬庫塞認為，通過這樣的分析，我們才能真正認清現實體制與制度的本質，在貌似合理的制度背後，所隱藏的實質是對人性的壓抑。但是，這一切卻是合乎文明發展本身的「辯證法」。這種制度體現在人格中便是弗洛伊德所說的「超我」(super ego)，它是正義、秩序、法律與道德的化身，是原始父親權力的再現，它將不合理的壓抑以制度的名義使其成為合理。

三、個體

制度的存在為其自身的合理性作辯護，一切因此都被一種體系的合理化、制度的秩序要求等「非個體化」的傾向所取代。馬庫塞認為，在「自由」資本主義向「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轉化中，「獨立的企業，以及後來的獨立個人企業，都不再是社會制度的細胞了，它們正被納入大規模的、非個體的集合體與聯合體之中。與此同時，衡量個體的社會價值所根據的主要是標準化的適應技術與適應性質，而不是自覺的判斷與個人的責任。」

因此，社會的一切機制都在與個體獨立、自由的要求相抗衡。這裡，文明發展的辯證法表現在：一方面，文明發展不斷為個體自由提供越來越多的物質及精神條件，例如：「工業文明的文化把人類有機體改造成一種更敏感，更有特色、更可交流的工具，而且創造巨大的社會財富，足以使這種工具實現自在的目的。可供利用的資源促進人類需求的質變(qualitative change)。勞動的合理化與機械化勢必減少消耗在苦役(異化勞動)中的本能能量，從而解放更多的能量，為實現由個體機能的自由消遣所確定的目標服務。」⁵⁶然而另一方面，文明的發展又是與個體相對立的，因為現代制度、技術與文化並未將技術從勞動工作中「解放」出來的能量用於個性要求，相反地，「把個體從曾為缺乏與不成熟所辯護的各種壓制中解放出來的現實可能性越大，想維持這些壓制並使之合理化、以免現存的統治秩序被瓦解的要求也就越強。文明不得不抵禦自由世界的幽靈(specter)。」⁵⁷

因此，文明的發展過程按其內在的邏輯是一個壓抑體、非個體過程。制度與文化要求個體嚴格服從社會的原則，只要與現實原則不符的個性都被視為不道德。

四、家庭

馬庫塞認為，個體的消失尤其反映在現代社會「家庭的社會功能的削弱」。

⁵⁵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p.91

⁵⁶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pp.92-93

⁵⁷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p.93

因為以前無論如何，是家庭在扶養並且教育個體，主要的準則與價值標準都是由個人傳遞並通過個人的命運而改變。

而現代社會，情況就大不相同，「在經濟、政治與文化壟斷集團的統治下，成熟的超我的形成似乎跳過了個體化階段，因為屬系原子已直接成了社會原子。本能的壓抑性組織似乎是**集體的**(collective)，而自我也似乎過早地被一整套超家庭機構及其成員社會化。早在學齡前階段，交友結伴活動、收音機與電視就已為人確立了順從與反抗的模式。對偏離這種模式的懲罰，主要不是發生在家庭內部，而是發生在家庭外部，而且往往是違背家庭意願。大眾傳播媒體的專家們傳播著必要的價值標準。他們提供了效率、意志、人格、願望與冒險等方面的完整訓練。家庭無力與這種教育相抗衡。在上代人與下代人的鬥爭中，雙方的地位似乎也發生了變化：兒子更為明智，而且他所代表的是一種成熟的現實原則，這與行將過時的父權形式的現實原則是相對立的。」⁵⁸

由上述馬庫塞對現代文明的統治「邏輯」的論述可以得知，由於文明自身的特點，文明越發展，對本能的壓抑也日益加深，文明必然會發展到其自身的反面。而且由於諸多的因素而使得人感受不到現代文明對於人性與本能的壓抑，或者已經使得人遺忘壓抑與「文明病症」的真正起源。因此，現代社會的「專制」與「統治」有其自身的特點：

首先是專制與壓抑的「非人格化」。在壓抑產生的早期，專制者是父親，是一種人對人的壓迫，因而反抗也是對具體的人格化獨裁的鬥爭。而現在，由於統治變成一個無偏見的管理制度(objective administration)，指導著超我發展的形象也就變得非人格化。以前，超我是由主人、酋長、首領來「充當」的。這些人以其具體的人格代表著現實的原則。他們既嚴厲又仁慈，既殘酷無情又賜福於下人。他們喚起了人們反抗的願望，却又懲罰這種願望。強迫人們順從乃是他們自己的功能與責任。因此人們對他們這些人及其作為除了尊重與害怕之外，還伴之以仇恨。他們為衝動及滿足這種衝動的自覺努力提供了活生生的目標。

但是，隨著制度化發展，這些人格化的父親形象在各種機構後面逐漸消失。隨著生產設施的合理化及其功能的多樣化，所有的統治都採取管理的形式。而在這種統治發展到登峰造極的時候，集中的經濟力量將人完全吞沒。「任何人，即使身居高位的人，面對這種設施本身的運作與規律，都顯得軟弱無力。控制一般由政府機關實施。在這個機關中，無論雇主與雇工都是被控制者。主人不再履行某種個體的功能。性虐待狂首領、資本主義剝削者，都被改造成某個官僚機構拿薪俸的成員，而他們的臣民是以另一個官僚機構的成員身份與他們打交道的。個體的痛苦、挫折與無能都導源於某種多產與高效率的制度，儘管在這個制度中，他們過著前所未有的富裕生活。負責組織個體生活的是這個整體，是這個『制度』(the “system”)，是決定、滿足與控制著他的需求的全部機構。攻擊性衝動(aggressive impulse)失去了攻擊的對象，或者說，仇恨所遇到的都是笑容可掬的同事、忙碌奔波的對手、唯唯諾諾的官吏與樂於助人的工人。他們都在各盡其責，

⁵⁸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p.97

卻又都是無辜的犧牲品。」⁵⁹

其次，現代專制是「集體」專制，是整個社會、整個文化體系與全體意識形態「共謀」的專制，因此，要想從這種專制中解脫出來，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罪惡仍然存在，它似乎是整體，而不是個體的一種性質。這是一種集體的罪惡，是一種隨意浪費和抑制物力資源與人力資源的社會制度的罪惡。」

因此，個體在這個社會中的力量顯得十分渺小，人似乎仍處於一種身心貧困狀態。因為社會學所得出的所謂結論是**非個性的平均數**，在機械化的同時也要求標準化，任何事物都是按生產要求而變得一模一樣。個人的生活條件的確得到改善，但這種改善被社會對生活的全面控制所抵銷。「人們住的是公寓群，乘的是限制了其他接觸的私人小汽車，用的是裝滿冰凍食物的電冰箱，看的是幾十種宣傳同一理想(*espouse the same ideals*)的出版物，玩的是無數精緻品和小玩藝，這些東西使他們忙忙碌碌，無暇顧及現實問題(*real issue*)，因而也不能萌生既可以少工作又可以確保自己的需求及滿足的思想。今天的意識形態的根據是，生產和消費再生產著統治，並為其辯護。然而生產與消費的這種意識形態特徵並不能改變它們具有實在的好處這一事實。整體的壓抑性在很大程度上就在於其功效，因為它擴大了物質文化的範圍，加速了獲得生活必需品的過程，降低了安逸與豪華生活的代價，擴大了工業生產的領域---但在同時，它卻又再維護著**苦役與行使著破壞**。個體由此付出的代價是，犧牲了他的時間、意識和願望；而文明付出的代價則是，犧牲了它向大家許諾的自由、正義與和平。」⁶⁰

意識型態所具有的控制與專制功能亦是如此，現代工業社會的意識型態首先是為現今的生產與消費服務，個體由此付出的代價是犧牲了自己的時間、意識與願望。現代工業與生活狀況的「進步」在於進一步增強這種意識型態的合理性，進而掩蓋其不合理的面向。在這種宣傳下，強大的社會凝聚力與管理的權力已足以使整個社會免於遭受直接的攻擊。而社會整體為了統一人們的思想，有意製造並渲染某種共同的「敵人」與「威脅」，使人們的思想與這個社會制度保持一致。這樣，整個社會的「攻擊性轉向了那些不屬於整體的人、其生存為整體所否定的人。這個敵人本身是以撒旦和假基督的面目出現的，他無處不在；他代表了隱蔽和邪惡的力量。由於他無處不在，就必須進行一次總動員。戰爭與和平、平民與軍人、真理與宣傳之間的區分被搞得模糊不清了。出現了一種早已逝去的歷史階段的倒退，而且這種倒退以全面性規模，甚至世界性規模恢復了施虐-受虐狂狀態。」⁶¹

再者，現代社會的人越來越無法認清自己真正的本能與需求，這就為那種「無以名狀」的全體專制提供繼續下去的基礎。

馬庫塞認為「勞動幾乎完全異化。裝配線的整套技巧、政府機關的日常事務以及買賣儀式，都已與人的潛能完全無關。工作關係幾乎變成了作為科學活動與效率專家的處理對象成了可以互相替換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確實，迄今尚很流

⁵⁹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pp.98-99

⁶⁰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pp.100-101

⁶¹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p.101

行的競爭需要一定程度的個性與自發性；但是，這些特徵已與它們所依賴的競爭一樣，變得膚淺與不真實(superficial and illusory)。事實上，個體在名義上只存在於對類的特殊表達(specific representation of types)中(如蕩婦、家庭主婦、硬漢、女強人、上進的年輕夫婦，等等)，正如競爭也將縮小到對幾類預定的小玩藝、裝飾品、調味品、顏料之類東西的生產上。在這個虛幻的表面現象背後，整個工作世界及其娛樂活動成了一系列同樣甘受管理的有生命物與無生命物。在這個世界上，人類生存不過是一種材料(stuff)、物品(matter)與原料(material)而已，全然沒有其自身的運動原則。」⁶²這種僵化的狀況也影響了本能、對本能的抑制與改變。原先的動態本能現在轉為靜態的，自我、超我與本我之間的相互作用凝聚成機械反應。超我的僵化伴有自我的僵化，它的表現就是在不恰當的時間和地點產生了僵化的性格與態度。意識越來越缺少自主性，它的任務範圍縮小到只須要使個體與整體相協調。

而對現代社會來說，這種協調(co-ordination)非常有必要，也非常有效。因為它減少而非增加總體的不幸。「由於個體的意識受到幕後操縱的約束(manipulated restriction)，使他對現行壓抑(prevaling repression)的認識(awareness)變得含糊不清。這個過程也改變了幸福的內容。幸福一詞所指的不僅是私人的、主觀的狀態。幸福不僅是一種滿足感，而且是一種實在的自由與滿足。幸福包含了知識：它是**理性動物(animal rationale)**的特權。但隨著意識開始衰退，信息受到控制，個體被大眾傳播同化，知識也受到支配與限制。個體並不真正理解所發生的事情。極其強大的(overpowering)教育與娛樂機器把他跟其他人結合在一種麻木不仁(anaesthesia)的狀態中，使他們不會再萌生任何有害的念頭(detrimental ideas)。而既然認識全部真理無助於幸福，那麼這樣一種總體的麻木不仁狀態便使個體感到幸福。」⁶³而整個社會就在這種似乎人人都感到「幸福」的狀態中繼續它的統治與壓迫。

⁶²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pp.102-103

⁶³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pp.103-104